Signs of Difference: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Social Life. Susan Gal and Judith T. Irv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319 pp.

劉子愷
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自1990年代末起，美國語言人類學家提倡以「語言意識形態」（language ideology）作為理論和民族誌方法，探討語言使用的社會文化脈絡和對話情境，此理論思潮強調語言使用蘊涵的不是單一的語言意識形態運作，而是多重又彼此衝突的語言意識形態的動態關係。經過二十年的學術發展，語言意識形態的理論取向是繼1980至1990年代的「語言社會化」（language socialization）理論之後，當代語言人類學最重要的理論思潮和研究取向（Gal 2005; Schieffelin, Woolard and Kroskrity, eds. 1998; Kroskrity, ed. 2000）。本書延續蘇珊・蓋爾（Susan Gal）和朱蒂絲・愛爾文（Judith Irvine）發表於保羅・克羅斯克（Paul V. Kroskrity）編輯的*Regimes of Language*（2000）書中，針對「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分化」的討論和理論為基礎（Irvine and Gal 2000），延伸發展的理論架構和民族誌資料分析，她們提出的理論也受到其它語言人類學家的影響（Philips 2000; Silverstein 1998）。兩位作者欲說明透過符號運作的過程而形成的對照（comparison）如何衍生為意識形態的差異（difference），透過這樣的角度進一步瞭解社會生活中的語言分化（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的多重脈絡和社會互動。本書強調「分化」（differentiation）作為意識形態的觀點（perspective）和符號化過程，人們對語言和語言實踐（亦即溝通）的分化之想法，包含三個互為影響的面向：不同符號之間的分化、人們所在的不同社會位置和身處不同歷史時間的分化、以及人們在社會生活參與不同項目間的分化。

語言意識形態指的是人對於語言本身和語言使用抱持的態度、想法或信仰，它受到個人喜好、政治經濟因素和社會文化變遷等諸多因素的交互影

響，因此使用某種語言可被指涉為政治正確與否、經濟地位高低、教育程度高低、語言純正／不純正的意識形態；再者，語言意識形態不只涉及語言議題，它連結微觀的語言使用和人際互動與宏觀的社會文化脈絡，也正是微觀和宏觀的連結，提供語言人類學家探究特定社會文化中的身份認同、權力、性別不平等、道德等刻板印象的運作和論述方式。譬如：「來自印尼的女性照護工說一口印尼腔調的中文」和「來自法國的交換學生說一口法國腔調的中文」，台灣社會對這兩群人的中文能力常存在明顯不同的語言意識形態，這樣的差異涉及個人不同的價值觀和信仰，也與社會階級分化和政治經濟的不平等互動直接相關。

本書除了導論之外，包含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以塞內加爾和匈牙利的民族誌資料闡述語言分化和符號關係，第二部分談論「分化的符號化過程」（semiotic process of differentiation），這部分也是本書最核心的理論架構，作者也在此提出語言分化的新觀點，第三部分是尺度和「尺度化作為對照的一種模態」（scaling as a mode of comparison），第四部分談及先前研究語言實踐的案例。

作者在導論中說明她們反對將「意識形態」視為教條一般，她們關注意識形態形塑社會行為的過程、意識形態的運作（ideological work）和意識形態化（ideologizing）的動態過程，她們認為意識形態化是未完成的過程或持續進行中的狀態。作者也運用語言案例，說明社交生活中的分化（differentiation）如何以語言的表述形式體現出來，而表述形式上的差異（difference）又如何與社交生活中的分化有所關連。作者提及的案例之一是說法語的語言意識形態，美國人認為會說標準的法語是很迷人的，但是法國人認為美國人無法說出標準的法語，如發出標準法語的“U”語音，代表美國人愚笨的特質。另一案例是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初步蘭群島進行巫術和園藝語言的研究（1978 [1935]），提及初步蘭巫師在儀式場合使用的咒語（magic spells）和非儀式場合使用的日常語言之間的差異，語言學家將此稱為「專用語域的分化」（register differentiation）。歐洲人的語言使用也可見專用語域分化，如科學場域使用的科學性用語與政治場域使用的政治語彙的區隔。因此，初步蘭人和歐洲人

對語言想法上的差異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各自有其看待語言分化的邏輯和運作方式。作者進一步指出馬林諾夫斯基沒有關注的面向，初步蘭人以“*biga peula*”的表述形式突顯他們關注如何透過語言傳達事實，他們也關注人的話語中哪些部分是事實的本質，這樣的視角也影響他們視語言使用為評價說話者的道德高低，也是建立社會聯繫重要的一環。

第一部分有兩章：第一章是愛爾文（Judith Irvine）在塞內加爾進行長期田野研究的民族誌資料，她關注沃洛夫語（Wolof）使用者的社群與種姓制度如何生產和再現「分化的意識形態」（an ideology of differentiation）。屬於高種姓位階的人，包括皇室和穆斯林教團的導師們，他們常使用“*waxu géer*”（高尚的談話方式），指涉他們的談話具有穩重、克制、自我控制，但又無趣的特質。屬於低種姓位階的人包括工匠和奴隸，他們則使用“*waxu gewel*”（傲慢的談話方式），其具有精力旺盛、易於流露情感、興奮的特質。作者提出不同種姓間的差異，以符號體現在談話方式上的差異，亦即來自高種姓位階的人與來自低種姓位階的人的「對比」，體現在語言的表述形式上。作者將談話方式的「差異」與社會位階的「對比」的關連性，稱為「談話專用語域作為述位化」（speech registers as rhematicization），以人際溝通的句子中出現的主位和述位（theme-rheme）關係延伸發展為「述位化」的概念（參考Gal 2005），意指種姓位階高低的對比成為「指向對比」（contrast of indexes），可將這樣的符號性對比關係類比表述形式的「描繪對比」（contrast of depictions）。

第二章蓋爾（Susan Gal）談論她在東歐匈牙利伯利鎮（Bóly）進行長期田野的民族誌資料。當地出生於第二世界大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之前的匈牙利人多講德語，之後年代出生的匈牙利人則使用匈牙利語交談，老一輩匈牙利人群使用的德語又區分「工匠使用的德語」（Handwerkerisch）和「農民使用的德語」（Bäurisch或Schwäwisch）。「工匠和農民」的對比呈現不同的說話方式，也與語言意識形態的分化相關，工匠使用的德語被當地人詮釋為說話漂亮的特質，農民使用的德語則被詮釋為說話真實的特質，兩種說話方式的對比「指向」（index）工匠和農民的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之差異，也突顯經由「分化的參考軸線」（axes of differentiation）的符號運作，指向當

地社會生活中的人物和角色的差異。作者特別關注在地社會存在的許多不同的語言特質和說話方式會在意識形態的分化中，被歸類為「工匠／農民」和“Handwerkerisch/ Bäurisch”的符號對比關係。

匈牙利在1940年代後進入社會主義集體生活，原本的個體農民和工匠就此消失，1946-1947年間半數以上講德語匈牙利人被驅逐到其他國家，到了1980年代社會主義政權解體後，人們開始展現懷舊情懷談論社會共產主義之前的社會生活，作者說明在匈牙利的不同歷史時期，「工匠／農民」和“Handwerkerisch/ Bäurisch”對比持續出現分化的符號關係，老一輩講德語的匈牙利人也開始有機會理解其他族群的人如何詮釋上述的對比關係。作者舉一位講德語的匈牙利女性老人為例子，說明她可以在同一談話事件中，因應談話對象不同而使用Handwerkerisch（工匠德語）或Bäurisch（農民德語），她的語言使用突顯「工匠／農民」的對比符號可跨越時間的界線，也可在同一脈絡中技巧性展現工匠和農民的認同。

第二部分包含三章：第三章談論符號與社會生活的關連性，也是本書最核心的語言和意識形態的理論。作者以鐵製雕像為例，說明雕像的各個部件需要使用銜接用的銜鐵固定，符號就如同銜鐵是看不見的，但卻是形塑雕像不可或缺的要素。再者，符號是多種社會關係運作的結果，它不是結構原則，由符號形塑的社會關係可稱為「符號關係」（sign relation），不同的符號關係更成為意識形態的組成要素，符號關係和與之建立的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它們受制於歷史偶然性，也可以賦予說話者和行動者有意義的行動（p. 87）。不同於作者先前有關「語言分化」的討論（Irvine and Gal 2000），本書的理論關注角度是「推測如何成為觀點的符號性骨架」（how conjectures are the semiotic armature of perspectives）（p. 88)。亦即形成語言分化的觀點需要有許多符號作為銜接，而不同方式的「推測」（conjectures）成為觀點的重要銜接。作者對於「推測」的說法承襲自美國哲學家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的三元符號論（1955）：客體（或符號對應對象）（object）、符號（sign）和解釋符（interpretant）。其中，「解釋符」指的是符號和對應事物（客體）間產生的效果，譬如：看到濃煙密佈（符號）便趕緊戴上口罩或迅速跑開。本書作者把「推測」等同於

皮爾斯提出的「解釋符」一詞，用於解釋說話者或行動者的推測，不論是猜測或假設，是經由將他（她）們的注意力轉向潛在的符號來完成的。皮爾斯並沒有討論到產生「解釋符」的特定社會文化場景和歷史背景，本書作者使用「推測」一詞更貼近符號的衍生意涵之運作，關注產生「推測」的社會場景和歷史。她們也採用美國哲學家納爾遜・古德曼（Nelson Goodman 1978）有關世界創造（world-making）的多樣性想法，說明她們的研究目的是「分化」的符號化過程，人透過各種可能的推測，符號性地體現分化觀點的多樣性，她們的想法不同於皮爾斯的符號學，皮爾斯只強調單一且正確的推論過程（p. 92）。

本書進一步提出人際溝通中的「後設符號性推測的系列鏈」（chains of meta-semiotic conjecture）或「向外伸展的系列鏈」（chains of abduction）概念，譬如：一個人看到樹梢的樹枝不停地搖動，「搖動」可被視為符號，「風」作為客體，若從符號到客體的取向，經由符號運作再現「風」，若從客體到符號的取向，決定搖動的符號意涵，人作為觀者運用「推測」結合這兩種取向解釋多樣的符號關係。若這個人當時抬頭看著樹梢，「抬頭」可被視為另一個符號，風作為客體，參與其中的人們對這樣的符號和客體關係可衍生新一輪的推測，因此，符號和客體關係可被重新組合，人往往依照先前有關「樹梢搖動」或「抬頭」的知識進行一連串的「推測」，重新詮釋進行中的事件、行動和脈絡，或是瞭解參與人們其一致性想法，這也是經由一連串的推測，讓參與其中的人對特定符號和客體關係形成多種的「觀點」（perspectives）。這些想法是本書最核心的理論架構，也是作者在語言意識形態的既有研究基礎上所提出的新關注取向。

第四章從「對比」的角度談論「分化的符號學」（the semiotics of differentiation）。作者根據她們先前提出的語言分化的符號運作（Irvine and Gal 2000），加入本書第三章提出的符號關係理論架構，以美國旅遊作家安妮・羅亞爾（Anne Royall）在十九世紀初期造訪美國維吉尼亞州、阿拉巴馬州和波士頓的遊記和書信作為民族誌資料，討論旅遊文本中符號性呈現「分化的參考軸線」（axes of differentiation），如：美國的「西部和東部」的對照是地區、氣候等地理空間的分化，也是說話方式快／慢、富裕／貧窮、

體型高／矮的差異。作者認為將不同的特質納入同一「西部」或「東部」範疇，這是「示意圖的肖像符號」（diagrammatic icon）運作形成的相似性。「西部和東部」就如同「基模」（schema）建立在先前建立的認知樣版，在符號的實際運作過程中，「西部和東部」成為對比符號，也是分化的參考軸線。作者說明這樣的參考軸線往往經由「推測」將指向性的（indexical）符號關係，轉變為肖像性的（iconic）符號關係，這樣的轉變稱為「述位化」。「西部和東部」的對照參考軸線也會在不同政治脈絡和歷史階段以分形遞迴（fractal recursivity）方式運作。分形遞迴指的是「西部和東部」的對照關係遞迴地從一個層面或社會場域重新出現在其它的層面或場域，因政治勢力和宰制關係的建立，甚至將軸線一方的語言定義為標準化語言。

第五章談分化的歷史變遷，任何類型的分化建立在對照關係，所有的對照關係又受到意識形態形塑。然而，任何「分化的參考軸線」或對比關係看似穩定不變，不同的政治目的和社會歷史變遷皆會讓「分化」和「對照」產生本質的變化。作者以「美國北方佬」（Yankee）一詞在美國歷史脈絡中的變化，來討論分化的歷史變遷，以英國作家和美國作家作品中描繪的美國人意象為資料，說明過去英國人稱呼所有美國人為“Yankee”，在十八世紀中期，英國軍方使用這個侮辱用詞稱呼美國殖民地的民兵。然而這個詞就像是「移指詞」（shifter），它的指涉對象會因根據使用方式、對比對象、什麼時代進行比較而有所變化。作者進一步從國家地理雜誌和美國政治人物的說法分析當代美國「南方和北方」的對照和刻板印象，如何在政治場域和制度化過程中再現或被重新定義。「南方和北方」的分化展現符號性的涵括性（encompassment）、拼接和標記性（markedness），以及「南方人看北方人」和「北方人看南方人」的社會關係的互動性。

第三部分有三章：第六章說明何謂語言意識形態運作的「地點」（site），作者認為當任何社會活動或是存在的事物涉及人的關注和詮釋過程，皆涉及意識形態的運作，也是研究分析關注的場域，即是地點。譬如：一群街頭表演者通過他們的實際行動來建立表演舞台（地點），符號活動（semiotic activity）創造了它的地點，也是參與其中的人、行動、相關事物可以被共同關注的舞台。作者進一步說明地點是一個「可理解性的空間」（a

space of intelligibility），在此空間內可引發人的關注，而語言意識形態運作的地點就如同照相機可觀看的視野範圍一般，是人可看到、聽到或感覺到的感知視野。街頭表演者將人行道作為臨時表演舞台，人行道可被視為「參考框架」（a frame of reference），連結人行道和其他表演地點的關連性，以及在地點內可能發生的談話或表演的詮釋過程。

第七章討論意識形態運作的地點如何與其他地點產生連結。作者以1990年代出現在美國巴爾的摩市公車庭的木製閱讀板凳和印刻文字為例，說明閱讀的意識形態的運作地點涉及的不只是「說話」（utterance）或閱讀而已，閱讀作為溝通事件包含許多不同的符號面向，人經由符號運作的「相關性」（construals of relevance）將相關的地點連結在一起，包括：人的一連串詮釋反應、類型化、歷史時間的連結、制度化，皆是透過意識形態運作將相關「地點」連結的方式。第八章進一步以「尺度」和「尺度形成」的概念解釋意識形態運作有相關的地點如何產生連結。

第四部分：第九章探討十九世紀兩位國會退伍軍人羅伯特・卡斯特（Robert Needham Cust）和保羅・漢法維（Paul Hunfalvy）的語言調查計畫和方法，他們受到當時語言學研究和「普遍性」（universality）的意識形態影響，熱衷於調查非洲、亞洲和歐洲邊陲社會中使用的沒有文字的語言和方言，作者關注語言學專家如何由書寫語言建立的一套研究方法調查沒有文字的語言，以及這些人語言研究涉及的「口語和書寫」對比的意識形態，將使用「口語文類」（oral genre）、「簡單語法」、「強調個人直覺」等特質類比於語言的原始性，並將使用口語語言存在的多樣性和變異加以抹除（erasure），以符合歐洲人對於沒有文字語言的期待和想像。

本書是難度很高的語言人類學著作，偏重於「分化的意識形態」理論架構的陳述和討論，它並不是一本語言人類學民族誌，除了第一章和第二章有較完整的民族誌資料分析之外，在其它章節中，語言資料和理論的對話性仍不夠完整、資料分析也不夠縝密，缺少詳細資料說明分化的符號運作、符號變遷的政治經濟背景和社會文化脈絡。讀者們可能需要對符號學和語言人類學的基礎知識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後，才有辦法將作者提出的理論架構轉化為田野研究方法和資料分析方法。建議可先閱讀兩位作者先前出版的相關

著作，並熟悉採用「語言意識形態」概念進行民族誌研究的案例（如語言復振、語言政策變遷、後殖民及解殖民）之後，再閱讀本書，以達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效果。

「分化」成為符號化和意識形態化已成為當代語言人類學的重要思潮之一，本書由「符號」（signs）、「推測」（conjectures）、「觀點」（perspectives）概念作為「分化的符號學」的重要組成要素，探究語言意識形態、分化、對比和認同的關連性，並對「推測」在符號關係的運作過程中扮演的功能和角色做了詳細而有創見的討論，將可對人類學、社會語言學、傳播學、社會學、文化研究、談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或其它社會人文科學相關領域以「意識形態」為課題的研究帶來啟發和新的討論方向。本書強調「分化的符號關係」的社會脈絡也可提供採用「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和「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研究語言現象的研究者，思考以「文本」本身探尋意識形態運作軌跡的侷限，以進一步思考如何由語言和社會實踐脈絡中的「分化」和「符號化過程」體現或再現意識形態的可能性。

參考書目

Gal, Susan
2005 Language Ideologies Compared: Metaphors of Public/Private.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5 (1): 23-37.

Goodman, Nelson
1978 Ways of Worldmaking. Indianapolis: Hackett.

Irvine, Judith T. and Susan Gal
2000 Language Ideology and 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 *In* Regimes of Language: Ideologies, Polities and Identities. Paul V. Kroskrity, ed. Pp. 35-83.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Kroskrity, Paul V., ed.
2000 Regimes of Language: Ideologies, Polities and Identities.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Malinowski, Bronislaw

1978 [1935]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Vol. Two: The Language of Magic and Gardening. New York: Dover.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55 Logic as Semiotic: The Theory of Signs. *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Justus Buchler, ed. Pp.98-119. New York: Dover.

Philips, Susan

2000 Constructing a Tonga Nation-State through Language Ideology in the Courtroom. *In* Regimes of Language: Ideologies, Polities and Identities. Paul V. Kroskrity, ed. Pp. 229-257.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Schieffelin, Bambi B., Kathryn A. Woolard and Paul V. Kroskrity, eds.

1998 Language Ideologies: Practice and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lverstein, Michael

1998 The Uses and Utility of Ideology. *In* Language Ideologies: Practice and Theory. Bambi B. Schieffelin, Kathryn A. Woolard and Paul V. Kroskrity, eds. Pp.123-1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